

中国农民工问题相关研究述评

胡杰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北京 100000)

【内容摘要】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学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从农民工问题的现状、影响因素与解决障碍、对策与前景等方面出发,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并指出了其不足。

【关键词】农民工问题 述评

中图分类号 C1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1-0032-03

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持续不断地涌进城市就业。然而,进城就业并不意味着这些农民就彻底完成了城市化,因为城市化并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空间位移,更重要的在于进城农民获得市民身份及权利,形成城市生活方式,融入城市社会。从现实来看,农民进城之后并不能顺利融入城市,而是成为了所谓的“农民”工,被排斥在市民权利的享有之外,处于城市边缘性阶层,生活方式与城市主流社会差距明显。这极大地影响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切实推进,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工问题”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而得以呈现。

围绕农民工问题,学界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都积极参与其中,成果颇丰。本文试对现有研究作一简要述评。

一、农民工问题的基本现状

我国农民工问题总体上体现为,绝大部分农民工都处于一种城市边缘化状态,无法融入城市社会。李强的研究证明,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十分低下的地位,而且,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将一部分属于底层精英的农民工长期排斥在社会底层的位置上^{[1][2]}。王春光指出,绝大多数农民工一直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产生社会隔离和边缘化累计问题^{[3][4]}。陈丰则认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逐渐进入城市,似乎已经城市化了,但实际上从享受城市文明的角度看,这一群体只是“虚城市化”,而非真正的城市化,他们不仅缺乏制度接纳,而且缺少城市社会认同,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5]。

具体来说,农民工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就业边缘化。农民工在城市大多属于“非正规就

业”,没有正式的就业身份、工作不稳定、收入十分低下、缺乏社会保障^[6]。而且,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外来农民工还面临城市就业政策的公开歧视与排斥^{[7](p142~143)[8](p84~90)}。

二是居住边缘化。大量农民工都居住在城市中条件最简陋、环境最恶劣、区位最边缘的住所里,他们与城市居民在居住空间上相对隔离^{[4](p140)}。农民工的一些聚居区甚至呈现出“类贫民窟”的特征^[10]。

三是社会保障缺失。农民工在很长时期内都享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待遇。近年来,政府开始探索实施农民工社会保障,但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等原因,许多农民工仍然游离于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之外^{[11](p248~251)[12](p315~335)}。

四是子女遭受教育排斥。大多数农民工家庭都难以承担城市正规学校的高额收费,便只能让子女进入条件极为简陋的“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甚至有一些农民工子女只能失学^{[13][14][15](p33)}。

五是劳动权益全面受损。主要表现为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工资被拖欠、克扣现象突出,超时劳动现象严重,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差,职业病患病率高,得不到应有的伤残待遇,社会保险权益难以落实,人身权利常受侵害等^{[16](p187~190)[17](p24~44)}。

六是社会参与渠道缺乏。农民工基本上被排斥在城市选举活动之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正式途径去影响城市各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他们甚至无权参与城市基层社区的自治活动^{[18][19][15](p37)}。

七是文化心理边缘化。城市居民普遍对农民工存在排斥和歧视心理^[20]。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圈子,在心理上产生“既不是城市人,又不是农村人”的边缘性认同^[4]。

二、农民工问题的影响因素与解决障碍

哪些因素制约着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存在哪些障碍?这些问题是农民工问题的关键,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综观现有文献,制度安排、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农民工的个人

* 作者简介:胡杰成,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资源等因素得到了集中强调。

(一)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安排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农民工在城市面临一种制度性排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如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是这种排斥的根源。这套制度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农民工在经济地位、社会生活、权益保障、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的困境。

李强指出,在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职业渠道、经济渠道、政治渠道、教育渠道等各种渠道中,农民工的地位变迁都受到了户籍制度的阻碍,这导致他们居于城市社会分层的最下层。例如,在就业方面,城市职工与农民工分属于典型的二元劳动力市场,这种劳动力市场区分的关键在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1][2][6]}王春光强调,“农民工”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种职业,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制度性身份,是我国现有社会体制,包括基于户籍制度的一整套制度设计和安排,造就了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现象和农民工问题^{[4][21][2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同样认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体制根源^[11]。

(二)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

从群体关系的角度看,农民工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农民工与市民相互接纳与整合的过程。一些研究表明,目前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磨擦、冲突与隔离,构成了农民工城市化的障碍。周春霞指出,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主要表现为心理上的相互抵触、语言上的口角争吵、行为上的打架斗殴,还有群体性的罢工、怠工、集体上访、违法犯罪等^[23]。卢国显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属于远距离等级的泛泛之交,主观距离比较大^[24]。

对于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原因,朱力认为,制度性歧视是主要原因,但也有农民工的活动条件与自身素质的限制^[20]。张春龙从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出发,认为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不平等、对资源的争夺,农民工对自己与城市居民差别合法性的怀疑,是引发冲突的机制^[25]。

(三)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美国社会学家波特斯认为,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诸如决定是否移民、向何处迁移,以及在迁居地定居下来如何适应当地生活等)都与移民的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密不可分^[26]。

随着社会资本研究在国内的升温,这一理论被引入农民工问题研究。许多研究都强调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刘林平的研究表明:平江人到深圳发展,靠的不是具有较充分的人力资本,也不具有充分的金融资本,而是充分地利用了社会资本^[27]。项飏认为“系”(以某一行动者为中心的多种关系的组合)是浙江村的发展中核心的关键环节,“系”内的变化和不同“系”之间的互动,促进了“浙江村”的形成,并使它具有现在的特性^{[28][p24]}。刘传江等认为,农民工的边缘性地位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和使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只有改善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的状况,才能促使农民工更快完成市民化^{[29][p185-208]}。

(四)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提高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和收入水平。在国外有关移民经

济地位获得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最早关注的问题也多集中于移民的人力资本对其经济地位的决定性作用。

许多研究都证明了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就业和收入的重要影响。刘林平等人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培训、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30]。姚先国等人的研究则表明,文化程度和职业培训是制约农民工就业和提高其职业层次的主要因素^[31]。

有研究者认为,从根本上说,目前我国农民工总体文化程度不高、职业技能缺乏的现状,是造成他们收入低、保障差、职业选择和就业空间狭小,以及就业竞争和替代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从长期来看,限制农民工提高就业地位和进入更高层次职业的主要障碍将是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32]。

三、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对策与前景判断

基于对农民工问题的影响因素与障碍的分析,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消除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制度,给予农民工国民待遇;变革城市社会组织机制,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的各类组织,转变市民的偏见和歧视观念,改善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等。

对于农民工实现城市化的前景,许多学者都表示出一种谨慎的态度。李培林指出,流动民工多数是在吃“青春体力饭”,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具备长远的竞争实力,一旦过了青春年龄或随着产业升级造成劳动密集部门劳力饱和,他们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另外,经济的发展总是有高潮和低落的时期,一旦增长速度减缓、经济紧缩,他们的处境也会比较困难^[33]。孙立平认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不仅在户籍制度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民工由于个人的素质而处于劣势,即使是将农民进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完全破除,他们要想真正进入城市也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城市越进步,农村与其的反差就越大,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可能性就越小。^{[34][p108-110]}王春光也认为,按照目前的态势,绝大多数农民工想马上融入城市是不可能的,至少需要两代以上人的时间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3]。

四、小结与评价

总的看来,现有文献对农民工问题的现状、影响因素与解决障碍、对策与前景等展开了全面的探讨,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成果,并提出了一些有指导意义的对策建议。同时,我们认为,现有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从理论上讲,现有研究缺乏对农民工城市化过程的内在机制的深入探讨。关于农民工的文献汗牛充栋,它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制度安排、市民态度、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留城意愿等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化的影响,但几乎都没有进一步思考一些更为深入的问题: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发挥对农民工城市化过程的影响功能的?农民工在制度身份、经济地位、社会生活、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城市化,是如何在某种机制的运转作用之下逐步推进和实现的?如不弄清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对农民工问题的认识难免流入肤浅。

其次,目前也还缺乏对农民工的较为系统深入的分类比较研究。“农民工”这一统一标签之下掩盖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它们之间在共性之外还具有不可忽视的差

异,如不同行业的农民工在工作、生活上就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城市化意愿和能力也差异明显。目前已有许多研究注意到农民工的内部分化,但它们基本上都停留在简单描述不同农民工的人口和社会特征差别,而缺乏一种更为宏观和动态的视野,忽视不同行业农民工面临的行业场域的差异,不同代际农民工面临的社会背景的变迁,从而也不能深入揭示个人特征和生存环境的差异如何导致不同农民工在城市化进度和前景上的差异。

最后,从方法上看,现有研究基本上采取的都是“一点”研究的方法,即对某一个地点(如珠三角的某个城市)的某一个行业(如制造业或服务业)的若干农民工展开个案访谈,或对某个农民工聚居的社区进行参与观察(如项飏的“浙江村”研究、刘林平的“平江村”研究)。这种“一点”研究无疑有其意义,但其根本毛病在于结论的普遍性很成问题。对东莞的几位制造业农民工的访谈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农民工的一般状况?长三角、北京等特大城市、中西部城市的农民工是否不同于珠三角?建筑业、服务业农民工是否不同于制造业?“一点”研究根本经不起这样的质问。这种方法上的问题并不是无解,类型比较法就是较为有效的解决之道。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认为,通过“类型比较法”可能从个别“逐渐接近”整体^[35]。在农民工问题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采取这种类型比较法,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农民工的“多点”比较研究,从特殊逐步接近一般。

参考文献:

- [1]李强.中国城市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底层精英问题[A].载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
- [2]李强.户籍分层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8).
- [3]王春光.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变化[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4).
- [4]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
- [5]陈丰.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J].社会科学,2007(2).
- [6]李强.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J].社会学研究,2002(6).
- [7]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 [8]李若建,闫志刚等.走向有序:地方性外来人口管理法规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9]钱文荣,黄祖辉.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工:长江三角洲十六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调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10]蓝宇蕴.我国“类贫民窟”的形成逻辑——关于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5).
- [1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 [12]郑功成,黄黎若莲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3]韩嘉玲.城市边缘群体教育问题研究——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A].载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14]项继权.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选择与制度保障——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分析及政策建议[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
- [15]韩俊.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
- [16]刘林平,万向东等.制度短缺与劳工短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17]江立华等.中国农民工权益保障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18]徐增阳,黄辉祥.武汉市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J].战略与管理,2002(6).
- [19]郑传贵.流动人口政治参与边缘性的社会学研究[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3).
- [20]朱力.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磨擦性互动[J].江海学刊,2001(6).
- [21]王春光.农民工在流动中面临的社会体制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4).
- [22]王春光.人力资本的获得与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流动——一种立足于制度视角的分析[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 [23]周春霞.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经济社会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04(3).
- [24]卢国显.我国大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 [25]张春龙.民工与市民冲突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2000(2).
- [26]赵延东,王奋宇.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2002(4).
- [27]刘林平.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J].中国社会科学,2001(5).
- [28]项飏.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0.
- [29]刘传江,徐建玲等.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30]刘林平,张春泥.农民工工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模型[J].社会学研究,2007(6).
- [31]姚先国,俞玲.农民工职业分层与人力资本约束[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 [32]张新岭,赵永乐,林竹,宋成一.农民工就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耦合分析[J].农村经济,2007(12).
- [33]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
- [34]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35]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73~306.